

中国文化史概论

黄新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概论

黄新亚 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图书在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概论/黄新亚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8

ISBN 7-80146-780-9

I. 中... II. 黄... III. 文化史—中国—对外汉语教
学—教学参考资料 IV. H195.4/H·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467 号

中国文化史概论

作 者	黄新亚
责任编辑	向 飞 王 洵 侯继刚 李 婧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2
电 话	(010) 66020531 (策划部) (010) 66051698 (发行部)
传 真	(010) 66051713 66026806
电子邮件	xiangfei@wanglaohu.com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850 × 1168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3.5 印张
彩 插	16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6-780-9/H·42
定 价	40.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图版说明

1. 北京人头骨。
2.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伏羲女娲图。
3. 浙江余姚河姆渡刻纹灰陶盆。
4. 西安半坡人面鱼纹彩陶。
5. 青海宗日舞蹈纹彩陶。
6. 黄帝陵。
7. 山西临汾陶寺龙纹盆。
8. 二里头青铜尊。
9. 殷墟甲骨。
10. 三星堆羊龙。
11. 三星堆青铜大祭司像。
12. 三星堆黄金面具铜人。
13. 西周淳化大鼎。
14. 西周折觥铭文拓片。
15. 战国货币。
16. 南宋马远绘孔子像。
17.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楚编钟。
18. 秦石鼓文拓片。
19. 秦始皇兵马俑军阵。
20. 秦陵铜车马。
21. 汉鎏金铜马。
22. 西陲汉简。
23. 玉门关外汉烽燧。
24. 嘉峪关晋墓壁画《采桑》。
25. 大同云岗石窟。

26. 敦煌 45 窟彩塑。
27. 敦煌藏经洞供养人图。
28. 怀仁集王羲之字《千金帖》拓片。
29. 法门寺佛指真身舍利。
30. 步辇图。
31. 西安出土胡姬俑。
32. 武则天母杨氏顺陵石走狮。
33.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34. 颜氏家庙碑拓片。
35. 柳公权书《玄秘塔碑》拓片。
36. 后梁散曲伎浮雕。
37. 《清明上河图》局部。
38. 宋官窑弦纹瓶。
39. 马可·波罗像。
40. 明长陵功德碑亭。
41. 明五彩鱼纹盖碗。
42. 17 世纪西方绘葡萄牙船只抵达澳门图。
43. 山东青州龙兴寺佛像上天主教士在中国活动绘图。
44. 敦煌榆林窟西天取经故事壁画。
45. 明陈洪绘《西厢记》插图。
46. 郎世宁绘《马》。
47. 清刻本《红楼梦》插图。
48. 郎世宁、王致汉等绘《万树园赐宴图》局部。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文化与中国文化	(1)
第一节 现代化与文化	(1)
第二节 文化的定义	(11)
第三节 文化的特性与功能	(14)
第四节 中国文化	(23)
第二章 史前文化	(45)
第一节 文化源头——中国早期人类	(45)
第二节 仰韶文化	(49)
第三节 龙山文化	(54)
第四节 炎帝和黄帝的传说	(55)
第五节 中国人的姓氏	(57)
第三章 商周文化	(59)
第一节 青铜器	(60)
第二节 文字	(65)
第三节 哲学的突破	(68)
第四章 秦文化	(85)
第一节 石鼓文	(85)
第二节 河曲马	(86)
第三节 整齐制度	(91)
第五章 汉文化	(96)
第一节 定都长安	(96)
第二节 汉初文化建设	(100)
第三节 丝绸之路	(112)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胡汉融合文化	(125)

第一节	胡族内迁	(125)
第二节	思想与宗教	(127)
第三节	艺术的自觉	(132)
第四节	敦煌石窟	(149)
第七章	唐文化	(159)
第一节	盛唐气象	(159)
第二节	佛教的中国化	(171)
第三节	唐诗的繁荣	(178)
第四节	唐代艺术	(191)
第八章	宋明理学文化	(195)
第一节	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化与文化精神的变化	(195)
第二节	从关学到理学	(208)
第三节	天理与人欲间的选择	(224)
第四节	从“为政治的艺术”到“为人生的艺术”	(245)
第五节	心——人生体验与理想追求的结果	(266)
第六节	西学东渐	(288)
第七节	困境与觉醒	(310)
第九章	市民文化	(334)
第一节	市民的崛起	(334)
第二节	人才与“人的发现”	(352)
第三节	群体意识再认识	(377)
第四节	传统文化的困境	(396)
结束语		(425)

第一章 概论：文化与中国文化

第一节 现代化与文化

文化问题是围绕现代化而产生的，所谓现代化是向最先进文明体系看齐的世界性的一种历史运动。严格意义上讲，产生于十五、十六世纪，西方殖民者利用他们先进的生产关系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文明，开始他们的殖民扩张，所有落后的不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痛苦的选择。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像德国、俄国、日本，当然也包括美国，它们向先进的文明体系看齐，加入到殖民国家的行列，也加入到原始积累的行列，自己也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第二种道路，如印度、奥斯曼土耳其，也包括中国的第三世界各国，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用古老的文明顽强地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结果结局最好的应当算是中国了。成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他的均沦为殖民地。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距离资本主义中心较远。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资本主义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时候其势力已经渐趋均衡。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基本上已经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挫折面前，所有落后不发达国家都不得不承认，如果想不亡国、不挨打，就必须向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文化体系看齐。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命题，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有个战犯叫山本五十六，他想和美国争夺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又恐惧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威力。于是，先发制人，在偷袭珍珠港时，首创用飞机攻击敌方军舰的战术。珍珠港事件发生在

1941年12月7日，一年多以后，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进行海战，就是所谓中途岛大战。作战双方都使用航空母舰，通过控制制空权而获得海上作战的优势。美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成员，并不因为航空母舰是日本法西斯的发明就不使用航空母舰了。相反还造出了超过日本数量和质量航空母舰。第二个例子是我们中国，在重庆谈判后不久的1946年，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毛泽东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宣布接受这场两种命运的决战。一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同志，毛泽东以非凡的勇气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美国有原子弹。”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的武器。”在做出这个论断10年以后，也就是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我们搞原子弹，不是说我们也要当纸老虎，而是要向以原子弹为标志的科学文化看齐，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原子弹是美帝国主义最先掌握的武器，我们就放弃对这种武器的掌握。事实证明，我们如果不能在20世纪60年代掌握原子弹，一定没有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就是我们说的向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看齐的意义。既然要向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看齐，就要寻找自己和先进文化的差距，也就是说对自己本民族所有的生活方式有一个重新的看法。于是，产生了对“文化”的讨论。所以说文化的概念意味着围绕对过去一切生活方式的重新认识。

这种强迫性的历史运动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情愿的。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接受侵略者的文化，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有一条无法超越的感情上的鸿沟，即使非常明智的思想家也很难立刻做出清醒的判断。例如1840年兵舰洋炮送来中国必须变革的信息时，最先做出反馈的林则徐“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

十位官府，四处探听。”^①“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取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②。这不过是了解对方而已，不出“知己知彼”的传统兵法要略。战败的教训使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③很明显，“师夷”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夷”，这种既要学习，又要抵抗的回答，反映了140余年来中国以知识阶层为代表的民族心理上的“二律背反”。

140余年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都告诉我们：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强大、繁荣，必须反省自己，批判扬弃传统文化，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存在，又必须强化民族心理的认同，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抵抗异族的野蛮入侵，结果又必须站出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学习与抵抗交织，使得传统文化向何处去的讨论多次反复。我们不妨从近代史上有关这一问题的几次讨论高潮来审视这种讨论的意义。

第一次讨论高潮是洋务运动时期，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使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经世致用”为名，考虑林则徐、魏源最早提出的问题。冯桂芬指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④这种从现实出发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影响了洋务运动中早期维新思想家，于是，“学习”之风高涨，王韬说：“治兵希先习西人之所长使之有伺无恐”^⑤，薛福成说：“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则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⑥马建忠说：“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新，而

①《海国图志》录外人报纸语。

②林则徐《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

③《海国图志叙》。

④《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⑤《操胜要览·仿制西洋船炮论》。

⑥《筹洋刍议·商政》。

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① 郑观应说：“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② 陈虬说：“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③ 这种例证，可以举出很多，这是一次特殊的辩论，一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讨论，早期维新思想家发现了与承认了中国的落后，于是将西方文化看做是“救亡之道”，“富国之本”，这样一来，必然与“恶西学如仇”^④ 的顽固派发生激烈的思想冲突，曾廉说：“西人言日大不动，而八行星绕之……窥其用心，止以欲破我天地两大，日月并行，君臣父子三纲而已。”^⑤ 可知顽固派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已到了何等地步。他们敏锐地感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击。势必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从而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场辩论虽然没有全面展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期维新思想家有洋务派官僚为后台，但是，历史的进程使中西文化比较的论证在戊戌变法前夕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这时候，资产阶级社会力量增加，维新思想家有了较为坚实的阶级基础，马关条约前后的民族危机，又带来了变法图存的爱国热潮，所以康有为敢于托古改制，并将维新宣传变成了变法的政治实践。仅仅依靠“大购西书以规讲求”^⑥ 的康有为对西方了解得并不多。但他能以《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进呈，说明他是主张运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力行者。在《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他说：“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这就形成了戊戌维新运动的最高政治目标。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一起作为维新思想代表人物的严复，直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更是以大规模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来推进变法运动，他指出“宋学”、“汉学”、

① 《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2《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② 《盛世危言·技艺》。

③ 《创设议院以通下情》。

④ 《清史稿·徐桐传》。

⑤ 《孤庵集》。

⑥ 《康有为自编年谱》。

“词章之学”都是“无用”、“无实”之学，“皆宜且束高阁”^① 他通过翻译《天演论》告诉中国同胞，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西方人则认为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竞争场所，“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所以，只有改变习以为常的处世哲学，投入竞争，中国才能强大，这样激烈的变革思想，在当时不可能不遇到阻碍，只是时代发展，即使顽固派也不得不正视西方文化确有优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处。如“严参康有为”的文梯也自称“留意西学”，“非绝口不谈洋务者比”，在湖南与谭嗣同激烈对抗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也说要“仿造织造机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在近代中国就是如此艰难，如鲁迅先生说一定要等到凿屋顶时才同意开气窗，早期维新思想已发展到了要求开议会行君主立宪之时，官僚阶层才开始同意办工厂，引进一点西学，正是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反复较量，才出现了折衷派的代表作——《劝学篇》，从政治作用看，这是一种空谈变法，实际反对改革政治制度的反动主张，历来为革命者所抨击；但它毕竟承认，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还提出一系列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已经提出了一二十年的变法主张。如废科举、改学制、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讲西学等，承认了中国传统文化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现实，承认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所以，“中体西用”不单单是封建顽固派、洋务派反对社会变革的思想体系，而且也显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曲折与微妙。这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当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保留固有文化与引进西方文化的论争上。这场论争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第三次高潮，即我们熟知的新文化运动。这本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延续，民主革命政权昙花一现，袁世凯掀起了复辟逆流，使各种封建传统文化中的沉渣泛起，迫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聚集于《新青年》周围，运用科学与民主这两个从西方输入的口号，

^① 《救亡决论》。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① 他们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他们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是“专制政治之灵魂。”^③“演成独夫专制之弊”^④。认为，“二十四史，浓血充塞”^⑤，正因为他们敢于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相较世界形势业已落后，不讳疾忌医，所以他们才能成为敢于借鉴、引进外来文化而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强者。正是因为有这些真正具有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人，中国才能从西方文化中找到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自身，“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⑥。传统文化本身不断发展演变的特性使得它能够适应时代的挑战，而承担迎接挑战重任的先锋，不可能是因循守旧的懦夫。只能是敢于正视现实又勤于思考的志士，从一定意义上说，促进传统文化适应时代而变革，才是真正强化民族自尊心，才是真正保卫民族文化。相反，人为地强化民族自信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至高无上的人，只能带来民族的衰老与民族文化的衰落，中西文化本来各有其体系，中国来没有“西化”，西方也不可能“中国化”，相互取长补短，本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然，承认我们的暂时落后，居于守势，更可以激励全民族的进取，所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争，虽然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永难走出的“二律背反”的命题，然而，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论争中，中国传统文化才逐渐明确了走向现代化的方向。

近年开始的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表面上看有些类似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批判性再反思和再评价，实际上是对“改革

①《李大钊选集》75页。

②陈独秀《敬告青年》。

③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④易白沙《孔子平议》。

⑤吴虞《消极革命之老庄》。

⑥《李大钊选集》104页。

与开放”时代的估计。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的重要步骤。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出路在于改革,那么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放,这种开放当然不等于用外来文化代替中国文化,从而取消中国文化。事实上,中国文化是取代不了的。任何外来因素若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后都将被淘汰,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但是我们又不能拒绝学习,我们需要把握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也需要把握外来文化的主体精神,这样才能找到可供选择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利用外来文化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历史指示的必然之路,我们增加了这种学习时所必须保持的理性精神,就可以少走弯路。例如西方学者一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谐”,在生产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运用伦理、道德,思想的力量。使各种矛盾趋于协调的整体之中,从而保持了古老帝国的存在与繁荣。于是我们的一些学者断言古代的和谐带来了近代的落后,现代化就是要打破这种“和谐”。在我们理性分析“和谐”之前,必须指出,在中国还有一种不和谐的传统,如西方学者描述过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他们吃苦耐劳,逆来顺受,承担着整个社会的重压,他们似乎是和谐力量的主干,然而,也就是他们,有过世界上次数最多,规模最大,行为最激烈的农民战争。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实际有着“和谐”与“不和谐”的二重性,一种急于求成的盲动心理。造成了缺乏科学思想的种种激烈的行为。要么闭关昏睡数百年,要么“一天等于二十年”,我们身受如此的教训难道还少吗?正因为如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与引进外来文化这一问题时,需要冷静的思考,我们不能或此或彼,也不能将二者机械相加,更不能知难而退,听之任之,理性的抽象概括,是把握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前提,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再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看中国缺什么,就补什么,或者把中国的弱点拿出来再批判一遍,现在,我们需要通过艰苦的工作,掌握自己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在这样一种反省、批判、改造、重建的过程中,找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是我们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目的。

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当然要借鉴 100 多年来有关文化学的各种成果，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文化虽然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可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来一个重新的开始，即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对于正在追求历史进步的民族来说，传统文化不仅是因袭的重负，如能正确对待，将成为民族历史前进永不衰竭的动力，相反，轻视传统文化的制约，进行主观的改革，往往造成失误，例如德国 1919 年 8 月在镇压了工人、士兵起义后颁布了魏玛宪法，它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政体，规定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义务，给予公民提出和表决法案、复决法律、表决罢免总统的权利，对于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德国来说，当然意义重大。但是，它脱离了德国的文化背景，施行的结果是一败涂地，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酿成大祸，中国也有类似的历史与现实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可以上溯到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战国至秦汉时代。适应那个走向统一的时代要求，即有人出来做关于统一的文化建设工作。已有学者的指出：《尚书·禹贡》就是战国一些士人设想大一统局面形成后如何管理天下的办法。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入世”、“出世”之争，儒家和法家之间的“爱人”、“治人”之争，多少也反映出土人对如何治理统一国家的考虑。最明显的作品是吕不韦召集门客所著《吕氏春秋》，这是兼采众家之长而寻求一种治国方略的举动。只是吕不韦在统治集团相互倾轧下被迫迁蜀自杀，《吕氏春秋》本应成为秦王朝的理论基础，反而被置之不理，甚至在焚书坑儒的磨难中险些付之一炬。所以，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与统治者缺乏思想理论建设，满足于“以吏为师”有关，秦王朝的失败教训了西汉统治者，于是在汉都长安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 4，189 页。

以思想理论建设为中心的文化建设，成为关系到西汉政权生死存亡和民族能否真正统一的大事。汉初贾谊总结秦亡教训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①就是说要想守住天下，就要行“仁义”，就要有新的统治思想指导。于是，刘安等人献上了儒道杂凑的《淮南子》，董仲舒更提出了他的“崇儒更化”之说：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祿日来。^②

正是如贾谊、刘安、董仲舒、司马迁等一大批士人退而结网，自觉承担了文化建设的任务，才使得西汉王朝稳定发展，也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中国的现实教训以“十年动乱”最为明显，十年动乱的基本理论之一就是林彪所散布的“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看来，中国不需要文化建设，不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相适应的理论研究，只要有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指示，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他们把这种无视传统文化的存在，也无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称之为“文化革命”。结果造成的空前劫难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修复。十年浩劫教训了我们，原来我们轻视了文化建设。我们曾经认为，既然我们的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所以革命胜利后的文化建设，也只要不断输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可以迎刃而解。然而我们忽视了中国革命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胜利后的文化建设，也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中国人也在改造马克思主义，正面的改造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

^① 《过秦论》。

^② 《汉书·董仲舒传》。

革命取得空前的胜利，非正面的改造是有意无意地用传统文化心理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僵硬化，用对待传统经学典籍的办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固定下来，甚至用来做打人的石头。当我们以拨乱反正的态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当然应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几条凝固化的结论，而是开拓性的研究，正因为时代的发展为当代历史学家提供了超过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历史研究的内容、方法、手段，因此，史学研究，尤其文化史研究，正是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工作，正因为学习、解释、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并非某个领导人的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时代需要，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改造，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所以中国革命胜利后，甚至在今天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中心转移之后，仍然需要一大批理论工作者来“退而结网”，进行适应新时期总任务需要的文化建设，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所以文化讨论不是什么历史悲剧，正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伟大工作的开始，而《中国文化史》课程的讲授和学习，也可以算是这个工作开始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学习《中国文化史》课程的主要意义。

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时期，文化却不能如西方社会所期待的那样“一体化”，相反，还会出现激烈的冲突，阿富汗“基地”分子和本·拉登都曾经是美国支持的反对苏联20世纪80年代入侵的武装人员，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美国曾站在伊拉克一边，然而，本·拉登和萨达姆的伊斯兰信仰无论如何不能和美国沟通，面对美国袒护以色列的政策和对伊斯兰教的不理解，终于导致用美国文明来教训美国人的事实。9·11事件的恐怖分子，需要懂得美国的建筑学，否则不可能撞击到世贸大厦的心脏；需要懂得航空学，否则不会想到用劫持的飞机作为攻击美国的武器；需要懂得计算机，于是，把预先设计好的软件放到劫持飞机的导航器上，使劫持飞机变成一架特殊巡航导弹，从